

《虹》的景观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发展

曾利红 黎明

(重庆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2160)

摘要:《虹》的景观叙述揭示维多利亚时期的工业化进程、商业资本主义扩张和世界主义的形成。《虹》书写乡村中存在一种逐渐增强的经济文化意向,城市中有逐渐增强的空间功能规划意识,从多个维度表明发展的运行轨迹怎样从无所不在的自然过程逐渐转变为一系列的意图刻意干预的进步。《虹》同时书写了社会关系的重新区隔,小说角色们产生逐渐增强的不确定的和疏离的身份感。工业、商业和科技的社会发展史与三代人的个人发展史相互渗透,相互矛盾,成为推动《虹》的情节发展的双重叙事动力链。

关键词:D. H. 劳伦斯;《虹》;景观;发展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19)02-0059-06

0 引言

1912年到1914年间,劳伦斯与弗里达相遇、私奔,而后结婚。这段经历赋予了劳伦斯新的家庭身份,他既是丈夫,又是弗里达孩子们的继父。斯克莱尼卡认为:“劳伦斯在家庭角色中的变化发展了他的现代性意识。”(Sklenicka,1991:56)几乎在同一时期,劳伦斯创作了小说《姐妹》。这部小说在出版时拆分成两部分:《虹》和《恋爱中的女人》。《虹》将成长、婚恋、生育和抗争这四个基本主题重复地展现在布朗温一家三代人的生活中,刻画了关于现代性的全新的感觉结构——混杂着工业化进程影响的家庭角色意识的变化。

劳伦斯巧妙地在《虹》中加入了许多时间标记和历史事件,小说的叙述可以被限定于大约1840至1903年的时间框架中,而这一时间段也恰是历史所称的“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如果说劳伦斯小说有“背景随时取代前景凸显意义”(毕冰宾,2014:36)的特点,那么,散布于《虹》中的作为背景框架的空间书写节点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结的、巨大的意义网络,表征了大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自由资本主义由方兴未艾到鼎盛,进而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进程的全景。一方面,劳伦斯努力书写布朗温家族史中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他展示了基于空间多样性的个体生活,主体的经验和真实世界之间所存在的裂隙。先前已经有研究从时代的社会、政治、宗教或者哲学等背景因素对《虹》进行了分析,但鲜有研究讨论《虹》如何表现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经济发展进程。我们的研究试图将《虹》视作一个不同时空之间各种差异现象的独特集合,勾画出《虹》暗中指涉的、融合和分割维多利亚时代的危机和契机组成的发展图景。

《虹》叙述了布朗温一家三代从少年到成年的发展历程,是混杂了代际史叙事特征的成长小说的变体,属于发展小说范畴。代际史的叙述文体使《虹》比通常的发展小说蕴含着更长的时间线。在《虹》的叙事时间的线性进程中,家族中的三代人在不同的时间点出现于同一地点或者具有同一属性的空间,就仿佛在各种横切面上构成了既有差异性,又有连续性的景观。个人的发展与更加广大的外部空间世界的

收稿日期:2018-11-15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2017085051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曾利红,女,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黎明,男,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变迁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三个不同时代的景观图景:以汤姆·布朗温为叙述中心的景观指向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初期(1840—1860年间),以安娜·布朗温为叙述中心的景观表征着维多利亚时代的中期(1860—1880年间),以厄秀拉为中心的景观则关联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晚期(1880—1900年间)。三个不同时代的景观使《虹》可以被解读为关于维多利亚时期的不同尺度和不同空间(家、乡村、城市和想象空间)的社会发展的具有理论意义和自足性的文本。《虹》的历史—地理叙事因此成为读者追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旧的社会空间解体和新的社会空间产生,以及伴随其间的业已建构和正在建构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解释性文本。

1 日常生活中的生产革命:从玛斯农场到贝尔寇特庄园

“生产关系烙印于日常生活的各种方式”(苏贾,2007:244)。日常生活物品的位置和流动通常与地方史、文化价值和经济结构存在深刻而密切的关联,可以用作解释有关文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力机制的判别性指标。《虹》的开篇以玛斯农场的景观为代表,书写了前工业化时代的典型的英国乡村风貌。农民们因为从事农业生产而与自然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的生活状态,他们“与土地、天空、牲畜和青青的树木之间有那么深的交情”(劳伦斯,2014:2)^①。紧接着,“大约一八四〇年”(5),因为一条运河大堤占了耕地,“布朗温家因此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补偿款”(6)。随后,受自耕地丧失、技术和商业进程的影响,布朗温家族成员逐渐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生活。评论界因此达成共识,《虹》试图反映“工业机器的受害者们的可怕生活”(Niazi et al., 2013:160)。事实上,在小说中,劳伦斯对于乡村空间的洞察和书写并没有因为布朗温一家人融入城市生活模式而终止。在第14章中,厄秀拉从城市返回乡村,去探望朋友玛琪在贝尔寇特庄园的家人。彼时,厄秀拉的男朋友宾斯基正在南非参加布尔战争,以此时间标记进一步推论,这次探访应该发生在19与20世纪相交之时,劳伦斯通过贝尔寇特庄园向读者例证了彼时英国农业生产模式的进步。

玛琪的家人是“看管人,猎场看守人加农场主”(410)。他们与玛斯牧场的布朗温家族类似,以栽种植物和蓄养畜禽为主要生产任务,体现了乡村区域农业生产文化的同一性。但是二者之间也有一些不同。布朗温家的农舍旁开满了洋水仙花,“门前屋后一丛一丛的丁香,绣球花和女贞,农舍完全掩映在花木丛中”(6)。水仙、丁香、绣球花和女贞都是观赏植物,而且全部是原产自欧洲的植株。在贝尔寇特庄园,种植的花卉是“樱草花”和“瓜叶菊”(410),樱草花在现代园艺中是典型的杂交植株,而瓜叶菊则是原产自非洲南部的植株,二者皆为引进和改良农作物品种的范例。此外,庄园里还种植了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大黄。比较这两处关于乡村生活环境的描写,可以看出,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光中,英国乡村中种植的花卉植物种类由常见的乡土品种转变为观赏目的更强的或者具有特殊经济价值的植株品种。本土原生的植株品种从关于乡村的新书写中被去除,就仿佛暗示着传统农业生产的消失。乡村叙事中新出现的植株品种则表征了在城市—乡村、农业—工业这种复杂的空间关系中,乡村/农业空间将城市/工业空间中的更具有消费性用途的植物置于优先位置。这一转变也可视作一种指标,表明了对于经济价值的更充分理解,促使原先的理性程度较低的农民经济文化意向崩溃,与此同时,关于价格/价值的更为专注的经济文化观念正逐渐在农村兴起。小说还提到大黄种植于“温暖的地窖”中(411),这一细节意味着乡村植物种植的空间由房前屋后的自然蔓生转而进入“温房”和“地窖”等经过刻意设计和修建的新的空间。传统培育方式的消失和新方式的兴起,意味着前工业化阶段的农村生态的广泛衰落,植物的自然生长进程向受控制的生物科学技术实践进程演化。

《虹》致力于揭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人们生活的破坏效果,但是另一方面,《虹》同时也暗示了工

^① 后文出自该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注,不另作注。

业化进程是引发乡村农业生产革命的契机,在乡村建构了新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活力,使原有的乡村生活方式在改良基础上得以存在。贝尔寇特庄园的成功转型意味着农业生产需要不断适应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困境,从维持生计的传统农业向专业化、商业化的农业转型,才能巩固农业生产空间的地位。贝尔寇特庄园的成功转型还意味着它自然化了工业生产模式对于农业空间的压迫,劳伦斯以惯常一样的隼永笔触书写庄园中的农村风景,似乎作家本人并没有表现出对于混杂了现代工商业文化的农庄自然景观的厌恶情绪。

2 从边缘到中心:威金斯顿和伦敦

翻开地理发展史,从苏伊士运河到巴拿马运河,19世纪下半叶实施的许多伟大工程开创性地把世界的各个部分连接起来。在叙述布朗温家族从农村迈进城市的进程中,连接乡村与城市的这两种异质空间的第一条纽带就是运河:“大约在一八四〇年,玛斯牧场上修起了一条运河”(5),“随即中部铁路伸向谷地的伊开斯顿山脚下”(6)。运河和铁路修改和重塑了乡村空间,它们流动的运动轨迹携来了“远方的世界”(6),也预示着新变化的产生。正在成形的小城镇,逐渐拓展的大都会,《虹》的书写中散布着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不断前进的城镇建设的叙述,向读者提供了一幅城市社会空间重组进程的斑驳画卷。

作为矿工的儿子,劳伦斯在《虹》中塑造了以煤矿业为支柱产业的小镇威金斯顿。威金斯顿只有七年历史,恰好展示了农业用地向工业化城镇转变的原初情形。“原来这里只是一个有11幢房子的小村庄”,发现煤矿之后一年以内,就出现了大批房子,“杂乱无章”,而且“没完没了的重复”(340),“像是一种皮肤病”(341)。镇上“没有集会场所,没有镇中心,没有主干道,没有整体的排列”(341)。这些描述反映了早期英国工业城市发展具有盲目、自发的特色。城市建设无规划、无秩序;住房拥挤;卫生状况差,而且环境恶劣。

《虹》书写了布朗温一家的多个成员在英国数个城镇的生活,比如伊开斯顿、诺丁汉、曼彻斯特、考塞西、威金斯顿和贝多弗等地。这些城镇暗示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处于高速的、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但是,不管生活于何处,有一个城市却在每一代人的生活中都出现过,这就是伦敦。通过书写三代人在伦敦的生活和旅行经历,《虹》间接表明了伦敦如何发展成为具有多重内涵意义的、历史空间的中心。伦敦首先是政治的中心,拥有强大的政治庇护和包容力的场所。来自波兰的战争难民丽蒂雅逃到英国的第一站就是伦敦,“教会照顾她,免得她缺吃少穿”(43)。第二代家族成员中,威廉·布朗温在厄秀拉出生后不久“去了一趟伦敦”,见到了“庞大的牛津大街和皮卡迪利广场”(186)。牛津大街和皮卡迪利广场所处的地块都曾经是贵族地产,18世纪和19世纪初,农业用地转为住宅和其他用地后,投机商人租用这些地块,建造了住宅,宽广的、规则性布局的街道和广场,并配备清洁和看守人员对这一区域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法雷尔,2016:176)。这种秩序井然、几何布局的空间规划意味着城市建设正逐渐变得理性化和组织化。《虹》同时提示了作为历史的主体的伦敦逐步吸收和积累,最终发展成为知识和信息的中心。比如,小说的后半部分描述小汤姆·布朗温在伦敦学习和工作,“跟伦敦最富有活力的科学界和数学界人士有了交往”(232)。这段书写刻意提及伦敦城的科学界和数学界人士,因为这些智力发达的人是城市崛起进程中的杰出代表和化身,他们有力地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历史性突变。

与早期的工业城市相比较,伦敦城的环境得到不断改善,19世纪末期,现代都市整洁、卫生舒适的物质环境初露端倪。第三代的厄秀拉也在伦敦旅行。“伦敦那些清静的住宅区给她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厄秀拉选择居住在“不列颠博物馆附近的一个安静的小膳宿公寓”(463),不列颠博物馆是当时英国城市中逐渐普及开来的公共设施的一部分。厄秀拉与斯克里宾斯基在夜晚约会时,想要去离城市远一点的地方,因为城里有“灯光和声音”(441)。这里的“灯光”指涉了伦敦城的路灯照明系统。伦敦是世界上第一个安装路灯的城市。将街道照明作为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的一部分在1875年的《公共卫生条例》中

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陆伟芳等,2001:52-53)。夜间的照明系统表明了意欲将伦敦建设成为拥有更先进的服务设备的城市系统的改良意图,也表明了社会制度和公共立法对于城市改造的推动作用,这同时暗示着以政府和立法机构为代表的国家理性高度地集合和联合了决策、财富和权力的多重需求,有力地推进了以伦敦为代表的工业城市的一层叠一层的改造。权利、决策和财富在小说开头提到的1840年代与铁路修建的情节中就有所暗示。从1840到1844年间,英国颁布了三项与铁路管控相关的法案,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1844年的《铁路监管法》。该法案详尽规定了铁路国有,赎回铁路应如何定价等事项,形成了公用基础设施现代监管制度的雏形,表明了维多利亚时期经济发展与行政监管二元体系的更深度融合,也因此产生了富有争议的新问题。这些变化意味着维多利亚时代生成了新的发展路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的发展趋势”(陆伟芳等,2001:50),从一个无所不在的固有概念变成了受一系列意图刻意干预的进步状态。

3 中心的消解:扩大的圈子与疏离的身份感

《虹》的第10章和第14章都命名为“扩大的圈子”,它们分别描述了厄秀拉青春期开始和结束时的生活。彼时恰好是19世纪的最后10年,“由相互竞争的帝国组成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之年”(Booth, 2009:41)。随着世界性空间的出现,作为中心的伦敦,在《虹》的空间书写中被矛盾地置放于两个坡面进行操作,一面是空间书写数次返回到伦敦,另一方面,书写又离开伦敦,指向更加遥远的地方,中心因此发生了分化。

小说第一章被命名为“汤姆·布朗温娶了一个波兰女人”(1),波兰一词意味着《虹》的地理叙事越过了英国本土的边界,辐射到了欧洲大陆。弥散于整本小说的波兰维度的叙事构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叙事之外的隐性情节系统,推动小说情节在两个国家空间双向滑动,互相渗透,这一叙事结构揭示了外国,尤其是欧洲大陆上的国家与英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双向影响。波兰叙事同时又是镶嵌于《虹》中的逐渐扩散的地理位置叙述的起点,在这之后,《虹》的叙事中逐渐出现了德国、意大利、法国、俄国、美国、苏丹、南非和印度等国家。《虹》中逐渐扩散的空间叙事网络模拟和预示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逐步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英国正在发生的认知和感觉方式的变化,人们可感知和可经历的生活空间变得前所未有的宽广。小说伊始,就提到布朗温家族的女性祖先们“最大的欲望就寄托在”“遥远、未知的世界边缘”的“斗争”上(3)。之后,遥远世界逐渐进入小说角色们的现实生活。安娜在少女时期能够收到一些“古旧沉重的俄国珠宝”(190)。威尔在结婚后曾经入迷的阅读一本“有意大利的、英国的、法国的和德国的教堂”的绘画书(152)。对于更广大空间中的感知经历赋予了人们全新的视角,将他们从单一的民族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具有了更为宽阔的视野。以宗教信仰为例,布朗温家族一直信仰基督教,安娜“按习俗常做早祷”(148),威尔终身“热爱教堂”(199)。第三代的厄秀拉却选择相信宗教具有多样性,而多样性是由地域差异造成的。厄秀拉意识到宗教其实是为了满足“民族的情趣或需要”(337)。宗教信仰是“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宗教却“因地而异”(337)。厄秀拉的宗教观中包含着“全世界”和“区域”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考量,她对多样性的信仰预示着一个崇尚混杂和模糊意义的世界主义的文化框架正在形成。

《虹》在结尾部分特别安插了两个有着英国之外的海外生活经历的角色,他们的人生穿行轨迹实现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和地方的连接。小汤姆·布朗温既是工程师,又是职业经理人。他在世界各地出差,去了“意大利,然后又去了美国”,“又去了德国”,带回来了“考塞西从未见过的”糖果、镜子、小项链等物品(234)。小汤姆·布朗温所代表的跨国商务人员的活动和实践对于地方、区域和全球都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影响,印证着19世纪晚期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国际生产体系。“汤姆总是或多或少地按别人的意愿来造就自己”,“没人知道真正的汤姆(舅舅)是什么样的”(283)。这暗示着小汤姆在跨境拓展的社会场域中不断移动,见证了复合的、多维度的文化冲突之后,他最终转变形成了柔性的、居间的文化表达方式。

小说中另一个在民族关系和空间的跨越中拓展了新的社会网络的角色就是宾斯基。宾斯基参加过在南非的布尔战争,之后去了印度。他希望自己在印度有“大量的工作”,比如修建“道路、桥梁”(440)。宾斯基的“印度梦”清楚表明了英国的海外殖民地移民运动也可以理解成为宗主国向殖民地输出资本和技术,进行现代化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改造进程。这一进程增强了区域之间的商品经济联系,或多或少是对于像伦敦这样的中心城市的建设路径的复制。像伦敦那样的已经建成的中心隔离了不能分享政治特权的人,新建的、分散于全球各地的、复制的城市接纳和汇聚了这些人,从而逐渐转变成新的构成性中心,削弱了已经饱和的原先宗主国的大城市的中心地位。从这一角度来说,宾斯基的“印度梦”也预示了中心的消解。小说描述厄秀拉想象自己在海外的移民生活时,产生了“英国消失了”(469)的感觉,这种感觉恰好印证了中心的分散。

《虹》的景观书写中暗指了一系列的类似于经济学的知识,这并不意味着劳伦斯在写作中刻意传递他本人对于经济发展或商务沟通的见解。《虹》所书写的社会发展景观是劳伦斯惊人的记忆力和广博的历史知识的展现。劳伦斯文本是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开放文本,从经济发展视角对其做出解读也是有可能的。对于经济和商务环境的书写建构了《虹》的叙事背景,衬托了劳伦斯试图前景化的主题:以布朗温家族成员不断发生裂变的身份意识和家庭关系来表达对于社会发展的焦虑感。小说反复指涉布朗温家庭成员在阶级和民族认同上缺乏归属感,汤姆·布朗温“跟富裕农民及业主们一起共酌,交了一批有钱人。但他哪个阶级的人也不算”(234)。小汤姆·布朗温“流畅地讲外国话”,依旧是“局外人”,“他没有根,哪个社会也没他的位置”(235)。最终,布朗温家族的成员们“互相疏远,人人有个性”“家庭关系很松散”(234)。家庭关系的变化其实是在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家庭空间的角度来看,《虹》的主要角色经历了从“植根于有机的自我满足的家庭生活到从其中完全根除”的向心的和离心的过程(D' Agnillo, 2010:10)。《虹》的主要角色们都表现出具有吸收外部空间进入家庭的趋势,同时具有相反的在家庭空间中拓展自我的趋势。这种充满矛盾对他者空间的追寻导致三代人不断陷入一种纷乱的过程。在不断吸收外部空间对自身意识的影响,同时又试图稳固自身原有意识的斗争中,家庭成员之间的意识形态不断分化,他们对于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感知都存在巨大差异。最终,近距离生活的人们却彼此之间越来越相距遥远,似乎都受到一个疏离系统的绝对支配。通过对这种矛盾的家庭关系和自我意识的书写,小说最终实现了对于工业化,商业扩张以及帝国主义体系的非人道特性的批判:有活力的市场和不容置疑的技术进步推动的外部空间的变化,与传统或稳定的自我身份不断地冲突。人们在这一矛盾运动中发现了先前生活方式的相对局限性,并不断质疑自我身份,因此产生了对于疏离和不确定性的感知。

4 结语

《虹》以布朗温家族三代人在工业化和殖民主义阶段的成长婚恋经历为中心,并刻意关注了诸如国际主义、移民、疏离、帝国等多个主题,构建了多重对立的情境,书写了布朗温一家三代人分布于不同的空间的个人生活。散布于《虹》中的时空书写指涉了欧洲工业化,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等一系列基于经济基础上的广泛变化,并隐约指涉了19世纪晚期的空间发展观念:发展意味着对于空间以及日常生活的战略性规划,是某种可以安排从而“改善进步之无序结果”的进程(Cowen et al., 1996:7)。

在这一发展格局中,个体不断吸收源自不同时空的各种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产生了具有杂糅性的,不断分化演进的身份感。《虹》同时将基于发展的反感和拒绝也混入到对于现代性的叙事中。小说角色们在逐渐扩大的社会场域中不断移动,体验了新的思考世界的方式,发现了原先生活方式中的相对局限性,自身的意识和真实知识间的距离,因此产生了认知和情绪的危机:对于疏离和不确定性的身份感知。

《虹》是劳伦斯在对于英国感到幻灭之前的作品。它虽然悲观地批判了工业化的消极影响,但小说结尾时的景象是壮丽的,预示着主体可能将朝着另一个未来方向改造当前状态。“这世界将在生命的真实中拔地而起,直耸苍穹。”(493)“生命的真实”是劳伦斯所倡导的对未来的社会 and 空间结构进行重新组织时的最优化原则。这恰似被提前绘制的未来地图,在读者头脑里创造出一种希望改变未来的渴望感。

参考文献:

Booth, Howard. 2009. *The Rainbow*, British Marxist Criticism of the 1930s and Colonialism[G] //Howard Booth. *New D. H. Lawre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Cowen, Shenton. R. 1996. *Doctrines of Development*[M]. London: Routledge.

D' Agnillo, Renzo. 2010. *D. H. Lawrence's 'The Rainbow': Re-readings of a Radical Text*[M]. Rome: Aracre.

McLean, Iain. Christopher Foster. 199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ulation: Interests, Ideology, Voters, and the UK Regulation of Railways Act 1844[J]. *Public Administration*, 3(70):313-331.

Niazi, N. Amir Ashrafi, Ehsan Honarjou. 2013. An Ecocritical Reading of D. H. Lawrence's *The Rainbow*[J]. *Journal of Basic. Applied Scientific Research*, 3(10): 158-166.

Sklenicka, Carol. 1991. *D. H. Lawrence and the Child*[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ouri.

爱德华·苏贾. 2007. 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 王文斌,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毕冰宾. 2014. 奇文共丹青一色——劳伦斯的小说、散文和绘画[M]//劳伦斯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劳伦斯. 2014. 劳伦斯文集:第4卷[M]. 毕冰宾, 石磊,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陆伟芳, 余大庆. 2001. 19 世纪英国工业城市环境改造[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50-55.

特里·法雷尔. 2016. 伦敦城市构型形成与发展[M]. 杨至德, 杨军, 魏彤春, 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Landscapes of Victorian Era in *The Rainbow*

ZENG Lihong LI Ming

Abstract: Landscapes narrated in *The Rainbow* is the metonymy for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expanding commercial capit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in Victorian Era. *The Rainbow* describes the enhanced consciousness in economy growth and spatial planning, indicating the trajectory of development from ubiquitous natural growth to the progress intervened by series of purposeful plans. Besides, *The Rainbow* reflects redivision of social relations, through the representation of developing and alienation in the self-perceived identity of character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penetrates into and conflicts with the individual growth, constructing the double dynamics for the chain of plots.

Key words: D. H. Lawrence; *The Rainbow*; landscapes;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冯革